

《解放日报》中 抗战胜利日的记忆

□ 郑学富

街小巷张灯结彩,庆祝胜利的标语五颜六色。

据1945年8月16日的《解放日报》报道,8月15日晚,东北各战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霎时,鼓乐喧天,无数火炬照亮了巍巍宝塔山和波光粼粼的延河水。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实验工厂、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完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

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诗人笔下的狂欢节

人民庆祝胜利的狂欢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他们用笔记录了人民欢庆胜利的盛况。女作家陈学昭在《纪念的日子》中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解放日报》1945年8月13日)!

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地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拥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解放日报》1945年8

月14日)。

萧三在《延安狂欢夜》中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涌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

鲁黎在《黎明的信号》中写道:“啊!兄弟们,姐妹们,让我们紧紧拥抱,让我们热烈的相爱,让我们生命溶结在一起,让我们举起这生命的火把,更高地举起这血的火把。更高哟,更高哟,向天上,向天上,把红色的太阳点燃起来”(《解放日报》1945年8月19日)。

萧军在《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决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解放日报》1945年8月19日)!

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作了巨大的贡献。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收复二百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

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社论最后说,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旗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9月5日下午2时,延安各界两万余人集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解放日报》9月6日在一版报道说:“鲁艺、联政、文协、完小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拥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经过八年苦斗所换取的欣愉。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

朱德总司令在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当讲到此处时,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振臂高呼口号:“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抗战八年,功勋卓著,是保卫中国、保卫和平的人民军队。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图。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

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 陕甘宁边区火柴厂

□ 马小江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6年,红军先后举行东征、西征战役,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苏区北达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12.96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设有36个县和1个特区。1937年3月,改称陕甘宁特区,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党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在有限的资金技术条件下,充分利用现有的各项资源,从零开始建设和发展边区工业,以保证抗日战争和民生供给的物质生产。

1940年,党在山西省晋西北关帝山诞生了延安丰足火柴厂,该厂是由国民党阎锡山所办的火柴梗厂接收过来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扫荡,晋西北行署决定,将该厂迁往陕甘宁边区。那时交通十分不便,搬迁过程中采用人抬、驴拉、驼运等简陋方法,耗时一年多,历尽艰难险阻,于1942年到达陕北延安。

1944年3月。选址在延安北郊狄青宰村,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火柴厂,属于八路军公营企业。厂长为杜子秀,书记林涛,副厂长尹希圣,全厂20多人。1945年初,火柴厂迁至石圪塔村。厂房和宿舍则由土窑洞或牲口棚改建而成。

当时,该厂在技术力量、机器设备、化工原料等方面十分缺乏,于是党组织决定:安排技术人员研究试制黄磷和氯酸钾,争取自力更生解决原料问题;同时派员去敌占区通过地下组织购买制造火柴的机器和原料。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各部门、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支持下,终于在1944年3月1日投产并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批火柴。

由于当时正值延安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于是周恩来将火柴定为“丰足”牌。

火柴商标由鲁迅艺术学院设计,正中“丰足”由两支麦穗环绕,果硕叶茂,象征丰衣足食。火花背面“边区巩固生产发展”(后改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八个字,并在侧面标注厂名。别小看火花这一小小的阵地,它激励着广大军民奋勇向前,英勇杀敌。火花四个角分别是“顶上火柴”四个字,这是由任弼时提议加上去的。让人一看,自豪之情,跃然纸上。

该厂在建厂初期除了制造火柴梗部分是机器生产以外,排梗、卸梗、粘药头、装盒、封装等工序都是手工生产。全厂职工只有20多人,他们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既是生产工人,又是战斗队,生产情绪很高,日产量可达3万多盒,满足了陕甘宁边区的军需和民用。此后,火柴产量逐年上升。1946年,火柴厂迁址安家寨,改名为延安丰足火柴厂。1947年胡宗南侵占了延安,全厂职工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一面生产,一面打仗。

1947年,火柴厂迁往砖窑湾西梁村生产。转战陕北时,火柴厂工人掩埋了机器,投入解放战场。但是火柴厂的工人,每人都算称得上是一个火柴生产小厂,因为他们身带火柴生产余下的材料,一边行军打仗,行军休息时间就蘸晾火柴、糊盒包装,直到用完火柴材料为止。1948年延安光复后,7月1日,火柴厂又在砖窑湾恢复了生产,并在山西购买了蘸头机,火柴的质量和产量大幅度提高。1949年,由于生产扩大了,砖窑湾周边糊火柴盒的人少,经贾拓夫指示,火柴厂迁回延安东关黑龙沟。糊火柴盒就是延安市民的一项有偿劳动,许多家庭都为火柴厂糊盒(糊40只盒可换一盒火柴)。火柴通用每盒装50根火柴。由于火柴盒一则费料,二则糊盒费工,厂里又没糊盒工,调整机器,改为每盒装100根火柴。由于火柴盒一时供应不上,市面销售的火柴就用秤称。许多年,延安都用散根火柴。

“丰足”牌火柴产量大,质量好,不仅满足了延安的需求,还大量运送到华北其它抗日根据地,更在中共七大时成为与会代表的纪念品,工厂特意在火柴盒上印上毛泽东头像,作为“七大”专用。毛主席对“丰足”尤为钟情,他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将两打“丰足”牌火柴作为礼品相赠,更是高兴地称其为“延安‘窑洞’之最”。

从1938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工业品和日用品基本达到自给,这为后来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现陕甘宁边区丰足火柴厂旧址仅存两孔窑洞,2020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延安时期我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的见证。

延安举行万人火炬游行

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接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日本向同盟国乞降。新华社的窑洞里一片沸腾,他们立即将这一胜利的消息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日本投降的消息不胫而走。连日来,人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奔走相告,立即传遍了延安城的每个角落。全市轰动,万人欢腾,各处的黑板报上都用大字报道胜利消息,大

·红色记忆·

瞿家湾——湘鄂西苏区红色首府

□ 李廷清

1925年,洪湖就有了共产党组织,瞿家湾也留下了共产党人早期活动的足迹。1927年,这里是洪湖赤卫队、游击队战斗最频繁的地方。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等人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洪湖,掀起红色风暴,领导穷苦大众拿起梭镖、大刀、鱼叉、猎枪闹革命,组织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战斗在河湖港汉,出没于芦苇荡里,坚持武装割据,在血雨腥风中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0年,第四军开创了洪湖根据地,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后组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湘鄂边与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红色区域——以洪湖苏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大红色根据地之一,亦是参加长征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

1931年3月2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洪湖瞿家湾正式成立。同年6月中旬,湘鄂西苏维埃联合县政府在瞿家湾改组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至此,瞿家湾这个弹丸小镇成为了湘鄂西苏区的红色首府,湘鄂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革命旧址、遗址密布,保存有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红旗日报》社、《工农日报》社等一大批革命旧址。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坐落在瞿家湾老街南侧西段的瞿氏祠堂,中共湘鄂西特委、湘鄂西苏维埃联合县政府、洪湖独立团(新六军)等机关也曾设在这里。1931年12月11日,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并正式成立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崔琪任主席。这座祠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是一座牌坊式高大建筑,为三进二厢房中式砖瓦结构。这里于1957年被建为《瞿家湾革命纪念馆》,由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王震亲笔题写馆名,1988年4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展柜上陈列着贺龙、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过的印章、土茶壶,湘鄂西农民银行

发行的各种纸币、铜币和银币,还有群众给部队做的拥军鞋,赤卫队员和红军当年使用的梭镖、鱼叉、土炮、自制手枪、锈迹斑斑的大刀和大量珍贵的照片,以及在瞿家湾印刷发行的《红旗日报》等珍贵的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

1931年6月上旬,沔阳、监利两县伪保安团曾纠集地主武装500多人,趁我地方红军北上开辟新苏区和接应红军主力而导致洪湖的兵力空虚之际,偷袭瞿家湾。留守的湘鄂西苏维埃军事部长彭国材率赤色教导军英勇反击,经过两天激战,消灭敌人240余人,缴获长短枪190多支,子弹数千发,胜利地保卫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旧址为二进二间中式砖瓦结构,坐落在瞿家湾老街南侧东段。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这里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机关所在地,第一进为分局办公室,楼上为保密室。第二进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和分局工作人员徐锡根等人的卧室。1932年,夏曦顽固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发动大规模“肃反”运动,万涛、孙德清、柳直荀、彭国材等一大批优秀的高级军事干部和苏区创始人被当成“改组派”惨遭杀害,致使部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1932年秋,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中,红九师官兵坚守瞿家湾,在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的英勇激战后,付出了伤亡3000多人的沉重代价,红色首府也沦陷敌手。

铁楼乡铁楼村

·丝路览胜·

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

□ 王水泉

铁楼寨,由软桥坝、铁楼街、河南坝三个自然村组成,古时为白马氏人聚居地。铁楼寨历史悠久,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铁楼乡旧寨村(离铁楼寨5千米)东500米的雷家大地上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旧寨村东距150米处第一黄土台地上发现的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就是最好的佐证。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在文县置阴平道,属广汉郡,铁楼寨为开发时期,为氏人聚居地,仅有少数汉人流入,造房置家,垦荒种田。这时的铁楼寨就居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磨子坪(今之河南坝),当时山上是原始森林,山下是沼泽地。前面有一块平地,居住着十多户人家,河边修水磨一轮,故称磨子坪。到了唐、宋、元时期,有苏、牛、马姓迁入。苏牛两姓占东半村,马姓住中间。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阴平为氏人杨茂搜所建的仇池国占有,公元477—580年间,建立氏人割据政权阴平国,这一时期的铁楼寨分别由仇池国、阴平国辖之。阴平国治所初为阴平后迁沙州。西魏文帝始置文州,统卢北郡、武阳郡、阴平郡,建正西县于今之旧寨村,隶属文州。隋废文州,以长松、曲水、正西3县改属武都郡,铁楼由正西县辖之;唐武德初,复置文州,移置阴平白马水,领曲水、正西、长松3县;唐贞观元年(627年)废正西县并入曲水县,铁楼由曲水县辖之;宋代由曲水县管辖;1236年,蒙古军队占领文

县,这时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开发金矿、煤矿,铁楼寨三个村都有金洞遗迹。屯田面积扩大,中原大部分无地汉民流入,汉族人口大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开展。在这时汉民李、乔两姓迁入河南坝,高、贾两姓迁入铁楼街,故有高家街、贾家街。元代州县废,由脱思麻路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辖;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起降州为县,由文县守御军民千户所辖,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西凉羌族反叛,朝廷派大将何建,副将张棣、姚林、刘正中,把总杨忠进行追剿,从西凉到武都、文县西元河口一直追到杨家山(今之阳梁山),西羌翻山而逃,大军收兵回营,留把总杨忠守边防杨家山,从此在杨家山屯田驻扎。民国年间铁楼寨还去杨家山收租。因此地有一小山梁,后称杨家山,后改称阳梁山。杨忠杀番勇数,与敌结仇,敌执杨父而报复。《文县志》载:“杨忠,邑人,其父为番所执,挺身赴救,父得脱,杨忠遂为番杀之。妻闻自缢



死。”派刘正中守刘家坪,姚林守姚困地(当时谓“营门上”)。刘姓占草坡沟刘家岭(至今有坟)。副将张棣守铁楼寨,占河南坝西南山头插占为业。河南坝西山头筑墩,名为班坞墩,中空堆积兽粪杂草,发现敌情,以烟为号,与竹林墩、烟墩取得联系互相呼应。张棣把守此墩,故此张墩名称而流传后

世,而张棣真名失传。成化六年(1470年)后由文县辖,隶阶州;白马峪河流域为土司马起远辖地。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铁楼村筑城设寨,称黑虎寨。明朝万历年(1573年),刘姓由刘家坪迁居河南坝,占西半村。村后有苏家地、刘家山、马湾,村西头称刘家河坝。河南坝对面为柳树湾,铁楼寨筑城以后,由于在西城门上,改称城门下。草子坪(今之软桥坝)原住十多户人家。清代,铁楼寨由文县辖之。民国初至1935年,白马河沿用清制,设铁楼、旧寨、新寨、西元4个乡(当时全县96乡),管理人员有1个约正,4个乡约,23个头人,约正由地方豪绅推选上报县府后任命,乡约由豪绅提名群众代表通过,头人由乡约任命;1935年实行保甲制,白马河除大小西园外,统编为第一区第四联保,共计有8个保,70余甲;1940年联保改为乡(全县13个乡镇),干沟坪以上51个自然村成立白马乡,共有6个保,50余甲,乡干部由县上任命,这一时期铁楼寨是其中的一个保,也是白马乡公所所在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文县人民政府成立,随之在全县成立5个区、41个乡,在铁楼寨成立铁楼乡,隶属兴文区;1958年12月在全县建立11个人民公社,铁楼寨隶属城关公社;1961年8月,全县公社划小,在铁楼寨成立铁楼公社;1983年10月撤公社建乡,在铁楼寨成立铁楼藏族乡人民政府。

(三)